

丛书

巍巍丰碑——重唤毛泽东

巨人的性格

——毛泽东的书信

巴君编

北京出版社



A751

6

6

巨人的性格——毛泽东的书信

巴君编



200217078

地震出版社

1992

(京)新登字095号

巨人的性格——毛泽东的书信

巴君 编

责任编辑：陆晓梅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民族学院南路9号

北京安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 1/32 3.875印张 93千字

1992年12月第一版 199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6200

ISBN 7-5028-0759-4/A·1 (1152)

总定价：21.00元 本册定价：2.30元

《巍巍丰碑——重唤毛泽东》

丛 书 编 委 会

主编 穆 宪

编委 穆 宪 赵喜明 李五一 王松鹤

傅强年 张金慧 王 薇 刘卫平

李中印 陈新权 张禹宾 杨 惠

李连仲 盖生福 樊 竞

参 加 编 写 人 员

穆 宪 李五一 佟 静 任铁缨

刘 燕 杨 惠 李华松 王 薇

温全信 商寅泉 张小莹 段 跃

姬 虹 聂北茵 沈雁英 贾秀娟

周涛勇 谢安邦 张世峰 阴建白

总 前 言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虽然与世长辞了，但人民没有忘记他，并在重新唤起对他的怀念。

对于这样一位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命运的历史伟人，他仍然活在人民心中，仍然在激励无数的中国人奋勇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这部由中央所属八个单位的专业研究人员联袂编辑的毛泽东专辑丛书《巍巍丰碑——重唤毛泽东》，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它是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的一份珍贵的礼物。

这套丛书除《伟大的足迹——毛泽东的生涯》一书是作者编著的外，其余七本均是根据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应当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是他们向读者提供了大量真实的反映毛泽东的经历、思想、社会交往及各种革命活动的珍贵资料。应当感谢李银桥、王鹤滨、张玉凤等早年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同志，是他们向读者披露了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的珍闻。此外，还应当感谢权延赤等一些热心从事编写毛泽东的经历、事迹的作者和出版各种版本介绍毛泽东的书籍的出版社。

总之，没有各方面的努力，这套丛书就不可能以“涵盖面广，信息量大，取材精练，史料充实，构思新颖”等特

点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套丛书在编辑过程中，曾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指导，这对丛书的编辑工作无疑是巨大的鞭策和鼓励。

最后，我们还要诚挚地感谢地震出版社所给予的大力支持与合作。

编 者

1992年12月

总 序

毛泽东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但他是二十世纪的历史巨人之一。他的事业和思想的影响不仅仅限于中国，而且早已超越了国界。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个异乎寻常的日子，全国许多出版社都在组织编辑出版歌颂毛泽东光辉一生的各种书籍。《巍巍丰碑——重唤毛泽东》八卷本丛书，就是其中的一种。编著者经过近两年的辛勤努力，终于使这套丛书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应当祝贺的事情。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由于历史条件，像许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他也有错误，例如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他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不管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他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宏伟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花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永彪史册的杰出贡献。他的业绩、思想和风范，值得世世代代传颂。

丛书《巍巍丰碑——重唤毛泽东》所选用的资料，虽然大都为人们所熟悉，但立意新颖，构思独特，八卷内容，各有不同，别具风格，是一套很有特色的丛书。读了之后，一定会深深地唤起人们对这位历史伟人的不尽思念。

丛书的编著者都是在京的中央有关部门的专业研究人员，他们所做的这项工作是很有意义的，在我看来，应当称赞。当然，就丛书的内容而言，它只是从几个角度反映了毛泽东一生中的某些方面。如果有可能，还可以用更多的篇幅来阐述毛泽东的丰功伟绩和他的光辉思想。

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始终保持着崇高的威望。他的丰功伟绩和光辉思想，是一座永存的丰碑，将永远激励人们奋勇向前。

在《巍巍丰碑——重唤毛泽东》这套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写了这篇序言，表示祝贺，并向读者推荐。我相信这套别具特色的丛书的出版，将为人们，特别是青年读者所喜爱。

盖 军

1992年12月

目 录

总序	(1)
致蔡和森等	(1)
致彭瓏	(12)
致李立三	(15)
致傅作义	(17)
致林彪	(19)
致宋庆龄	(21)
致蔡元培	(23)
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	(26)
致张学良	(29)
致叶剑英、刘鼎	(31)
致蒋介石	(33)
致徐特立	(36)
致何香凝	(38)
致雷经天	(40)
致艾思奇	(42)
致陈伯达	(44)
致张天闻	(48)
致毛岸英、毛岸青	(53)
致肖军	(55)
致周扬	(56)

致李鼎铭	(58)
致秦邦宪	(60)
致郭沫若	(63)
致谢觉哉	(65)
致柳亚子	(67)
致毛岸英	(68)
致李济深、沈均儒	(69)
致吴玉章	(71)
致吴晗	(72)
致杨开智	(74)
致冯友兰	(75)
致毛森品	(76)
致李淑一	(77)
致王逸民	(78)
致毛泽连、毛远悌	(80)
致黄炎培	(81)
致廖静文	(84)
致田家英	(85)
致百城乡党支部、乡政府	(87)
致李达	(89)
致林猷	(91)
致曹云芳	(92)
致黄炎培	(94)
致杨开英	(96)
致藏克家等	(97)
致孙燕	(98)

致张治中	(99)
致邓小平	(100)
致周世钊	(101)
致胡乔木、吴冷西	(103)
致刘少奇、周恩来等	(104)
致陈云	(105)
邓小平	(106)
致胡乔木	(107)
致陆定一等	(109)
致陈毅	(110)

致蔡和森^[1]等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和森兄子昇^[2]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接到二兄各函，欣慰无量！学会^[3]有具体的计划，算从蒙达尔尼会议^[4]及二兄这几封信始。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今得二兄各信，我的计划书可以不作了。我只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会友，对于二兄信上的计划，人人下一个详密的考虑，随而下一个深切的批评，以决定或赞成，或反对，或于二兄信上所有计划和意见之外，再有别的计划和意见。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明确的路数。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学会也只是盲进，结果糟踏了各人自己之外，又糟踏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岂不可惜？原来我们在没有这个学会之先，也就有一些计划，这个学会之所以成立，就是两年前一些人互相讨论研究的结果。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同时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取，也颇有研究。但因为没有提出具体方案，又没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讨论的机关，并且两年来会友分赴各方，在长沙的会员又因为政治上的障碍不能聚会讨论，所以虽然有些计划和意见，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里，

或几人相会出之于各人的口里，或彼此通函见之于各人的信里，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已。现在诸君既有蒙达尔尼的大集会，商决了一个共同的主张，二兄又本乎自己的理想和观察，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我们不在法国的会员，对于诸君所提出当然要有一种研究、批评和决定。除开在长沙方面会员即将开会为共同的研究、批评和决定外，先述我个人对于二兄来信的意见如左⁽⁵⁾。

现在分条说来。

(一) 学会方针问题。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子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和森在八月十三日的信里说：“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除无产阶级专政一点置于下条讨论外，国际色彩一点，现在确有将它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

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⁵这是一层。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以下说方法问题。

（二）方法问题。日的——改造中国与世界——一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的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¹⁶，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昇则说：

“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¹⁷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¹⁸兄来信，主张与子昇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笼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

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基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于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⁹⁾在长沙演说，意与子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¹⁰⁾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口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

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须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不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它相等的一力去抵抗它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抗它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它，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11〕}，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米，哪有回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12〕}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13〕}称帝。有袁世凯^{〔14〕}失败了，偏又有段祺瑞^{〔15〕}。章太炎^{〔16〕}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它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

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亡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瘠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¹⁷⁾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三）态度问题。分学会的态度与会友的态度两种。学会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潜在”，这在上海半淞园曾经讨论过⁽¹⁸⁾，今又为在法会友所赞成，总要算可以确定了。第二是“不倚赖旧势力”，我们这学会是新的，是创造的，决不宜许旧势力混入，这一点要请大家注意。至于会友相互及

会友个人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互助互勉”（互助如急难上的互助，学问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互勉如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第二是诚恳（不滑），第三是光明（人格的光明），第四是向上（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第一是“相互间”应该具有的。第二第三第四是“个人”应该具有的。以上学会的态度二项，会友的态度四项，是学会及会友精神所寄，非常重要。

（四）求学问题。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处，诸君办法此间必要仿行。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上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办法最好没有。我意凡有会友两人之处，即应照此组织。子昇举力学之必要，谓我们常识尚不充足，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诚哉不错！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弟为荒学，甚为不安，以后必要照诸君的办法，发奋求学。

（五）会务进行问题。此节子升及和森意见最多。子昇之“学会我见”十八项，弟皆赞成。其中“根本计划”之“确定会务进行方针”，“准备人才”，“准备经济”三条尤有卓见。以在民国二十五年前为纯粹预备时期，我以为尚要延长五年，以至民国三十年为纯管预备时期。子昇所列长沙方面诸条，以“综理会务大纲，稳立基础”，“筹办小学”，“物色基本会员”三项为最要紧，此外尚应加入“创立有价值之新事业数种”一项。子昇所列之海外部，以法国、俄国、南洋三方面为最要。弟意学会的运动，暂时可

统括为四：1. 湖南运动，2. 南洋运动，3. 留法运动，4. 留俄运动。暂时不必务广，以发展此四种而使之确见成效为鹄，较为明切有着，诸君以何如？至和森要我进行之“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册子”、“亲属聚居”、“帮助各团体”诸端，我都愿意进行。惟“贴邮票”一项，我不懂意，请再见示。现在文化书社^[1]成立，基础可望稳固，营业亦可望发展。现有每县设一分社的计划，拟两年内办成，果办成，效自不小。

（六）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紧要，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此节和森信中详言，子昇亦有提及，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我的意见大略说完了。闻子昇已回国到北京，不久可以面谈。请在法诸友再将我的意见加以批评，以期求得一个共同的决定，个人幸甚，学会幸甚。

弟 泽 东

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根据《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刊印）

注 释

〔1〕蔡和森（1895—1931），又名蔡林彬，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早年同毛泽东等一起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19

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主编，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在广州牺牲。

〔2〕子昇，即肖子昇（1894—1976），湖南湘乡人，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后，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等职。

〔3〕学会，指新民学会，是由毛泽东和蔡和森、肖子昇等发起，于1918年4月在湖南长沙成立的革命团体。毛泽东是实际负责人。学会最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后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1920年有一些会员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了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活动。

〔4〕蒙达尔尼会议，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子、李维汉、蔡畅等1920年7月在法国蒙达尔尼（今译蒙塔尔纪）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

〔5〕原信系从右至左竖写，“如左”即“如下”。

〔6〕迪克推多，是英文“dictatorship”一词的音译。意为专政、独裁。

〔7〕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8〕李和笙，即李维汉，又名罗迈。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的成立。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6月与赵世炎、周恩来发起组织旅法少年共产党，10月代表少年共产党回国接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本信中说到的李和笙关于“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的意见，是他留法期间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一度所持的看法，不久就改变了。1979年他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谈到1920年下半年自己的思想转变时说：“约在

八月至九月的时间内，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鬻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做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革命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 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决裂等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9〕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社会活动家。1920年来中国讲学。同年10月曾到长沙讲演。

〔10〕荫柏，即彭璜，新民学会会员。当时是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会计干事。

· 礼容，即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当时是长沙文化书社经理。

〔11〕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原文为：“与学者语，正如扶醉人，东边扶起却倒向西边，西边扶起却倒向东边，终不能得佗卓立中途。”后被朱熹收入《近思录·为学》作“与贤说话，却似扶醉汉，教得一边，倒了一边，只怕人执著一边”。

〔12〕拿破仑第一，即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政治家 and 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

〔13〕拿破仑第三，即路易·波拿巴（1808—1873），拿破仑一世之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

〔14〕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辛亥革命后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地主买办阶级联合专政的北洋军阀政权。1915年12月宣布实行帝制，1916年3月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取消帝制。

〔15〕段祺瑞（1865—1936），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

领。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曾任国务总理、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实行卖国投降政策。

〔16〕章太炎，即章炳麟（1869—1936），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1906年加入同盟会，开展革命宣传工作。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顾问等职。1924年后逐渐脱离民主革命运动，专门从事讲学。

〔17〕德谟克拉西，是英文“democracy”一词的音译。意为民主、民主主义。

〔18〕1920年5月，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举行会议，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会议提出新民学会应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态度。

〔19〕文化书社，是毛泽东等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而在长沙创办的进步书店，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

致彭璜¹⁾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荫柏兄：

示奉悉，出入证收到，感甚！日前论及待人态度，意犹未尽。弟为不愿与恶人共事之人，谅兄所深知，但疾恶如仇，弟亦不为。恶人自己不认为恶，一也；吾人恶之，未必无蔽，二也；恶在究竟，仍不为恶，三也；一个人，才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四也。第三第四两点，兄亦时作此言。第一点属客观，第二点属主观，为观人所不可忽。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于吾兄久欲陈其拙愚，而未得机会，今愿一言，倘获垂听，有荣幸焉。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常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的当。然除一、三两条及

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第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奚当？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断断，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却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理论论法，私交论情。兄于礼容⁽²⁾，我觉未免过当，立意不十分诚，泄忿之意多，而与人为善之意少。兄说待我要反抗，兄看我为何如人？如以同某人款待我，则尽可“不答应”，何“反抗”是云。至说对某某及礼容要“征服”，则过矣过矣！人哪能有可以征服者，征服必用“力”，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抵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此情形弟亦常经过，非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惟有屈服“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兄以为何如？今晚从城里归，已十二点钟，又与孩子们谈坐一小时，再写此信，有想就写，文句不贯，意思不贯，原有是幸！此颂

大安

弟 泽 东

一月二十八日夜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彭瓚，又名荫柏，湖南湘乡人。1919年6月任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1920年夏，与毛泽东等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组织俄罗斯研究会。

〔2〕礼容，即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当时是长沙文化书社经理。

致李立三^{〔1〕}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2〕}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3〕，〔4〕}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6〕}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邮政通信处“

”^{〔5〕}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 释

〔1〕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

〔2〕陈毅，当时任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3〕开慧，即杨开慧（1901—1930），湖南长沙人，毛泽东的夫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岸英，即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

〔4〕泽民，即毛泽民（1896—1943），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之弟。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5〕指陈独秀当时在党内散布托派观点，成立小组织等反党活动。

〔6〕现在保存的此信的抄件中，引号内空缺。

致傅作义⁽¹⁾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四日)

作义主席先生勋鉴：

涿州之战⁽²⁾，久耳英名，况处比邻，实深驰系。迩者李守信卓什海⁽³⁾向绥进迫，德王⁽⁴⁾不啻溥仪⁽⁵⁾，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弟等频年呼吁，要求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幸人心未死，应者日多，抗日图存，光明渐启。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亟望互派代表，速定大计，为救亡图存而努力，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拜启

八月十四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 释

〔1〕傅作义（1895—1974），字宜生，山西临猗人。当时任国民党绥远政府主席、国民党第35军军长。1947年1月，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建国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水电部部长。

〔2〕涿州之战，指1927年10月至1928年1月晋军傅作义部和奉系军阀部队之间在河北涿州进行的攻守战。当时阎锡山的晋军改称国民革命军，阎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阎部在京汉、京绥出击奉军，第四师师长傅作义率领所部为挺进队突入隶（今河北）省，占领涿州。在奉军的猛烈围攻下，傅部孤军坚守涿州城三个月。

〔3〕李守信，当时任伪蒙古军政府参谋部部长、伪蒙古军第一军军长。

卓什海，即卓特巴扎普。当时任伪蒙古军副司令。

〔4〕德王，即德穆楚克鲁普（1902—1966），内蒙古锡林格勒盟正白旗人，王公。1938年5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任伪蒙古军政府总裁，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5〕溥仪，即爱新觉罗·溥仪。

致林彪^[1]

(一九三六年)

林彪同志：

你的信我完全同意，还有一点，就是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一部分。如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并重，文化工具就是“实际”的一部分。如你所说的实际与理论联系，文化工具乃是能够而且必须用了去把二者联系起来的。如果学生一切课都学好了，但不能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仍是很有限的。如果一切课学了许多，但不算很多也不算很精，但学会了看书作文，那他们出校后的发展就有了一种常常用得的基础工具了。如果你同意此意见，那我想应在二三两科，在以后的四个月中，把文化课（识字，看书，作文三门）更增加些，我意把它增加到全学习时间（包括自修时间）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请你与瑞卿^[2]同志考虑这个问题。定期检查时文化应是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

敬礼！

毛泽东

二十六日十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 1 〕 林彪（ 1907—1971 ），湖北黄冈人。当时任抗日红军大学校长。

〔 2 〕 瑞卿，即罗瑞卿（ 1906—1978 ），四川南充人。当时任抗日军大学教育长。

致宋庆龄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¹⁾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央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央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²⁾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³⁾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央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⁴⁾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 释

〔1〕指蒋介石。

〔2〕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3〕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

〔4〕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孔祥熙（1880—1967），山西太谷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

宋子文（1894—1971），广东文昌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

李石曾（1881—1973），河北高阳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

蔡元培（1868—1940），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早年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是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1916年底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1928年起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曾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1940年在香港病逝。当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

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致蔡元培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子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敬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少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倡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中山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綿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¹⁾，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子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

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境，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李石曾先生，吴稚晖先生，张溥泉先生，于右任先生，孙哲生先生，居觉生先生，覃理鸣先生，柳亚子先生，叶楚傖先生，邵力子先生，汪精卫先生，陈璧君先生，经亨颐先生，陈公博先生，顾孟余先生，曾仲鸣先生，甘乃光先生，张静江先生，戴季陶先生，陈果夫先生，丁惟汾先生，宋子文先生，陈树人先生，褚民谊先生，彭泽民先生，李任潮先生，李德邻先生，陈友仁先生，邹海滨先生，徐季龙先生，朱霁青先生，白云梯先生，恩克巴图先生，李福林先生，陈护方先生，程颂云先生，唐孟藩

先生，朱益之先生，李协和先生，柏烈武先生，刘震寰先生，谭逸儒先生，张知本先生，冯自由先生，谢慧生先生，茅祖权先生，蒋雨岩先生，孔庚先生，郭沫若先生，沈雁冰先生，陈望道先生，李鹤鸣先生，胡适之先生，章行严先生，周作人先生，钱介盘先生，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段锡朋先生，陈宝镛先生，张东荪先生，彭一湖先生，彭泉舫先生，杨端六先生，胡子靖先生，陈凤荒先生，周谷城先生，舒新城先生，以及一切之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而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

道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 释

〔1〕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1]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任潮先生并请转致

德邻健生先生勋鉴：

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敝方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现托钱君携呈尊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²¹，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贵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

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专此奉复。

敬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 释

〔1〕李济深（1885—1959），字任潮，广西苍梧人。1927年国共分裂后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组织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任主席。失败后去香港。1936年两广事变时，曾赴广西支持李宗仁、白崇禧反对蒋介石。1948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人，桂系军阀首脑。1936年曾参与发动两广事变，反对蒋介石。1949年一度担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同年12月去美国。1965年7月回到北京。

白崇禧（1893—1966），字健生，广西桂林人，桂系军阀首脑。1936年曾参与发动两广事变，反对蒋介石。

〔2〕指1936年两广事变中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议和避免战争一事。

致张学良⁽¹⁾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²⁾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阻拦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与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敌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呈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十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张学良，1901年生，辽宁海城人，东北军爱国将领。1935年10月起任国民党西北“剿总”副司令。1936年12月和杨虎城一起发动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被蒋介石长期关押。

〔2〕胡宗南（1896—1962），浙江孝丰（今并入安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在陕北进攻红军。

致叶剑英、刘鼎^{〔1〕}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

剑鼎二兄：

（一）经济甚紧，外面用费须节省又节省，千万不可过费。无论何时不要丧失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别人的馈赠。只有到了万不得已时，才允许向别人借一点钱用，日后如数归还。一切用费均须报帐。因近日接连发生几件浪费事，故向二兄指出此点，并请向雪枫^{〔2〕}、理治^{〔3〕}及其他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随时提出对此问题的警觉。苦久了的人难免见风华而把握不住，故应作为一个问题，对同志做教育与警戒的工作。

（二）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价值的（例如艾思奇^{〔4〕}的《大众哲学》，柳湜^{〔5〕}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选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在外面的人，一面工作，一面要提倡看书报。

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三) 请你们写一个带分析性与综合性的报告来。

润 之

十月二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当时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做统一战线工作。

刘鼎，1930年生，四川南溪人。当时中国共产党派他在红军与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

〔2〕雪枫，即彭雪枫。

〔3〕理治，即朱理治(1907—1978)，江苏南通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驻东北军的特派员。

〔4〕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人，哲学家。当时是上海《读书生活》杂志编辑。他的《大众哲学》是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著作，原题为《哲学讲话》，1936年上海读书出版社发行第四版时改名《大众哲学》。

〔5〕柳湜(1903—1968)，湖南长沙人。30年代在上海、汉口、重庆等地从事党的文化工作，曾任《读书生活》、《生活日报》、《全民抗战》等报刊编委、主编。《街头讲话》是他写的一本介绍社会科学知识的大众读物，1936年由生活书店出版。

致蒋介石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请先生将幡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策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福麟、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²⁾。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兵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

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3]与上海一二八之役^[4]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避国之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首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蔷^[5]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石印件刊印）

注 释

〔1〕1935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陕西郿县（今富县）直罗镇全歼东北军第一〇九师和第一〇六师一个团，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这次战役称直罗镇战役。

〔2〕山城堡之役，指1936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方面军一部，在第二方面军配合下，在甘肃环县山城堡击败国民党军进攻的战役。这次战役全歼敌主力胡宗南部一个多旅，使敌军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

〔3〕长城抗日，指1933年8月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古北口一带长城线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由于蒋介石集团坚持对日妥协政策，中国守军被迫撤离长城各口。这次抗战以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告终。

〔4〕一二八之役，又称淞沪抗战。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坚持抗战一个多月，给敌军以沉重打击。这次抗战因国民党政府的破坏而失败。

〔5〕王稼蔷，即王稼祥。

致徐特立⁽¹⁾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²⁾，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臢臢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

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此致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于延安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

〔2〕1913年至1919年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毛泽东曾在那儿求学。

致何香凝^[1]

(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

香凝先生：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2]，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³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4]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象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敬祝健康！

毛泽东上

六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何香凝（1878—1972），广东南海人，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画家，廖仲恺的夫人。早年加入同盟会，随同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长。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她辞去国民党政守的一切职务，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建国后，曾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

〔2〕《双清词集》，是廖仲恺的诗词集，192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出版。

〔3〕承志，即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廖仲恺、何香凝之子。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4〕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诗人。早年加入同盟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41年谴责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1944年在重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经常力向各救国组织的“寒之友社”成员题词，共同表达胸中的愤慨。

致雷经天⁽¹⁾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²⁾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根据手印印稿)

注 释

〔1〕雷经天（1904—1959），广西南宁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是审判黄克功案件的审判长。

〔2〕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当时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1937年10月，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

致艾思奇^{〔1〕}

(一九三七年)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2〕}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3〕}（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艾思奇1937年10月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任主任教员。

〔2〕《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继《大众哲学》之后，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1937年4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37年9月毛泽东作了《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

〔3〕指毛泽东在所作的摘录中对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中一个论点的质疑。艾思奇的论点是：“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如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同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

本无矛盾的，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在摘录艾思奇这一论点后，写了以下一段话：“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握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

致陈伯达⁽¹⁾

(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

伯达同志：

《老子哲学思想》⁽²⁾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³⁾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思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一) 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老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二) 事物的实不止属性，还有其最根本的质，质与属性不可分，但有区别的，一物的某些属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变，由于所以为其物的质尚存。“志气”，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内)，气似指是及属性，变动的东西。

(三) “君子不能从行为中分出什么是有仁有多少是不仁”，这句话的意思应是：君子做起事来却只知做不仁的事，不知做仁的事，似更明白些。

(四) 说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说同时即是必然性与

偶然性的关系。“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这必然性的表现形态则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现形态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现。因此，“没有这部分的原因就一定不会有十月十日的武昌起义”是对的，但辛亥革命的必然性（大故）必定因另一偶然性（小故）而爆发，并经过无数偶然性（小故）而完成，也许成为十日十一日的汉阳起义，或某月某日的某地起义。“不是在那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就不一定成为燎原之火”是对的，但也必定会在另一最恰当的时机爆发起来而成为燎原之火。

（五）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4〕}、“两而无偏”^{〔5〕}、“正而不可摇”^{〔6〕}，与儒家的“执两用中”^{〔7〕}、“择乎中庸服膺勿失”^{〔8〕}、“中立不倚”、“至死不变”^{〔9〕}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9〕}，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

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个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六）“半，端”问题

墨子这段，特别是胡适的解释，不能证明质的转变问题，这似是说有限与无限问题。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陈伯达，1904年生，福建惠安人。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2〕陈伯达的《墨子哲学思想》一文，1939年、1940年陆续发表于延安《解放》第八十二、第一〇二和第一〇四期。墨子，名翟，战国初期思想家，墨家学派的创立者。

〔3〕赫拉克利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爱非斯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哲学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列宁曾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

〔4〕见《墨子·经上》。原文为：“欲正权利，且恶政权害。”

〔5〕参见《墨子·经说上》。原文为：“仗者，两而勿偏。”孙诒让《墨子间诂》中说，“仗”当作“权”。

〔6〕参见《墨子·经下》。原文为：“正而不可担”。孙诒让《墨子间诂》中说，“担”当作“播”。

〔7〕参见《中庸》。原文为：“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8〕参见《中庸》。原文为：“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9〕参见《中庸》。原文为：“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致张闻天⁽¹⁾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

伯达⁽²⁾同志的《孔子哲学》⁽³⁾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惟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⁴⁾,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却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昭则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

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

(二)“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反映了社会中君与臣的关系”，不如倒过来说：“社会中(说国家中似较妥当)君与臣的关系，反映了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事实上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国家发生以前，家庭是先发生的，原始共产社会末期氏族社会中的家长制，是后来国家形成的先驱，所以是“移孝作忠”而不是移忠作孝。一切国家(政治)都是经济之集中的表现，而在封建国家里家庭则正是当时小生产经营之基本单元，如伯达所说的“基本细胞”，封建国家为了适应它们的集中(封建主义的集中)而出现。

(三)中庸问题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⁵⁾，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⁶⁾，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⁷⁾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

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³⁾。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四)说孔子“患得患失”时不必引孔子做鲁国宰相“有喜色”一例，因为不能指出当做了官的时候除了“有喜色”之外应取什么更正当的态度，问题在于那个官应不应做，不在有无喜色。

(五)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子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

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象“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9]，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践实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六）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七）此外，文没有一个总的概念，使初学看了觉得缺乏系统性，如能在文前或文尾对于孔子哲学加以概括的说明，指出其根本性质则更好。我看过的伯达的几篇文章，似乎都有此缺点。

以上几点并未深想，只是随说一顿而已。

毛泽东

二月二十日夜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张闻天（1900—1976），又名洛甫，上海南汇人。当时任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毛泽东写给张闻天的这封信的手稿，抬头现已损缺。

〔2〕伯达，即陈伯达。

〔8〕这里的《孔子哲学》，即《孔子的哲学思想》，1936年发表于延安《解放》第六十九期。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立者。

〔4〕见《论语·子路》。

〔5〕参见《中庸》。原文为：“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上为舜乎。’”

〔6〕参见《中庸》。原文为：“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7〕朱熹，南宋哲学家，编注有《四书集注》等书。

〔8〕见《四书集注·中庸》朱熹注。

〔9〕参见朱熹《四书集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原文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致毛岸英、毛岸青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岸英二儿：
岸青一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1]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

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
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 泽 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林伯渠，1939年是中国共产党驻西安的代表。

致肖军^{〔1〕}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

肖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
近好！

毛 泽 东

八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肖军1907年生，辽宁锦县人。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致周扬⁽¹⁾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日)

周扬同志：

此篇⁽²⁾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³⁾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⁴⁾，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根据手稿打印）

注 释

〔1〕周扬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2〕指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编者序言，后来发表于1944年4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辑录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托尔斯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

〔3〕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4〕这是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编者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一书的汉译本中，这段话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致李鼎铭⁽¹⁾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²⁾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以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禱！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李鼎铭（1881—1947），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2】李健侯，陕西米脂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

致秦邦宪⁽¹⁾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博古同志：

此文⁽²⁾改了一些，原拟发表，后觉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故决定不发表，而请报馆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了。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看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³⁾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从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

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下应该也不可能的。

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襄垣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內），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內）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以上，请给艾、陆、余⁽⁴⁾三同志一阅。如有意见，请告知。

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秦邦宪（1907—1946），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

〔2〕指原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解放日报》社论草稿。

〔3〕指1944年8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就山西襄垣李来成建立新式家庭一事发表的社论，题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

〔4〕艾，指艾思奇。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副刊部部长。

陆，指陆定一。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总编辑。

余，指余光生（1906—1978），浙江镇海人。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致郭沫若^[1]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2]，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3]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4]，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和革命活动家。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周恩来任副部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任第三厅厅长，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在国民党统治区组织进步人士从事抗日宣传工作。

〔2〕《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1944年3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著名史论著作。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3〕太平军，是洪秀全等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1851年1月在广西金田村举行起义，先后转战桂、湘、鄂、赣、皖、苏、浙等十余省，有力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但是，太平军在占领的地方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了许多错误。因此，它不能抵抗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于1864年遭到失败。此后它的余部又继续奋战了两年多。

〔4〕《反正前后》，是郭沫若1929年写的反映自己1910年至1911年生活经历的作品，1929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1958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沫文集》第六卷。

致谢觉哉^[1]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

觉哉同志：

此件很好，略有增删，请斟酌。

关于参议会改为人民代表会议^[2]，我想对内对外都是有影响的，请你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这一点以及此次参议会的其他问题，中央想讨论一次，请告高林罗^[3]诸同志。

政治民主有其自己的内容，经济是其物质基础，而不就是政治民主的内容，文化是精神的东西，它有助于政治民主，也不就是政治的内容。这些请考虑。

人民各项权利，在我们这里，只能说实现了几个重要部分，例如，管理政府，工作权，在现有物质条件限制下的言论、出版、集会权等。至于休息权，中国目前大体上还谈不到，工农更是如此。教育权、老病保养权，还在走头一步。苏联宪法是几个五年计划的产物，在中国许多部分还是理想，不是事实。又，在我们的这类文件上，不宜提及苏联宪法，免人误会。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

〔2〕毛泽东1944年12月2日又给谢觉哉写信说：“参议会改名，关涉各解放区，中央尚未讨论，请暂不提”。

〔3〕高，指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林，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罗，指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致柳亚子

(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是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1〕}，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 泽 东

十月四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陆游，南宋诗人。

陈亮，南宋思想家、文学家。

致毛岸英⁽¹⁾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岸英：

告诉你，永寿⁽²⁾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³⁾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的，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

〔2〕永寿，即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

〔3〕李讷，毛泽东之女。

致李济深、沈钧儒⁽¹⁾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²⁾

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 释

〔1〕李济深（1885—1959），字任瀛，广西苍梧人。1927年国共分裂后任国民党政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1933年联合十九路军组织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任主席。失败后去香港。1936年两广事变时，曾赴广西支持李宗仁、白崇禧反对蒋介石。1948年起任中国国民党委员会主席。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爱国民主人士、律师。

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

〔2〕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在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

致吴玉章^{〔1〕}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

吴玉章同志：

未元电^{〔2〕}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毛泽东

八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吴玉章（1878—1963），四川荣县人。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

〔2〕指1948年8月13日吴玉章给周恩来的电报。在电报中，吴玉章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志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致 吴 晗^{〔1〕}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2〕}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革命的敬礼！

毛 泽 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介绍乔木同志来见，乞加指教。他是这里的秘书，兼管新华社工作。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吴晗(1909—1969)，字辰伯，浙江义乌人，历史学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秋进入解放区，11月毛泽东在河北平山会见了。建国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

〔2〕指吴晗所著《朱元璋传》一书。1948年11月吴晗到达河北

平山，将此书的修改稿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提出了一些意见。后来，吴晗在1965年版《朱元璋传》的自序中说，这些意见使他“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

致杨开智^{〔1〕}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日)

杨开智先生：

来函已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岸英岸青^{〔2〕}均在北平。岸青尚在学习。岸英或可回湘工作，他很想看外祖母。展儿^{〔3〕}于八年前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光荣地为国牺牲，她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你们不必悲痛。我身体甚好，告老夫人勿念。兄从事农场生产事业甚好，家中衣食能过得去否，有便望告。此复。敬颂大安。

毛泽东

八月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杨开智，湖南长沙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

〔2〕岸英，即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

岸青，即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

〔3〕展儿，即杨展，杨开智之女。

致冯友兰^{〔1〕}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三日)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象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冯友兰，1895年生，河南唐河人。当时是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致毛森品^{〔1〕}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

森品学兄如晤：

前后两信均收甚慰，因事迟复为歉。钦明^{〔2〕}兄为革命牺牲，不胜叹惜，亦是光荣之事。所述干部工作中之缺点，所在多有，现正加力整顿，期能有所改进。吾兄出任工作极其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进清德，不知以为然否？风便尚祈随时惠示周行。敬祝健进。不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毛森品，湖南湘乡人，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同学。

〔2〕钦明，即毛钦明，毛森品之兄，曾与毛泽东同学。1928年牺牲。

致李淑一〔1〕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

淑一同志：

来信收到。直荀〔2〕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
佩慰。学习马列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
即可达到目的。肖聃午亭〔3〕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顺颂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李淑一，1901年生，湖南长沙人，柳直荀的夫人。当时在湖南长沙福湘女中任教。

〔2〕直荀，即柳直荀（1898—1932），湖南长沙人，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1932年牺牲。

致毛逸民^{〔1〕}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

逸民同志：

一月三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感谢你详细地将乡里情形告诉我。

乡里贫苦人民生活困难，烈士家属更加困难，暂时只好忍耐一点，待土地改革后就可能好一些了，那时人民政府也可能给人民以一些帮助，例如贷款等，人民就可以逐步改善自己的生活。

烈属的照顾是全国范围内的事，全国有几百万户烈属，都要照顾，自未便单独地特殊地照顾少数地方。但最困难的人民，当地人民政府在减租时土改时及青黄不接的岁月，应当尽可能给以照顾。

你在乡里做工作，很好，可以常常来信，告我以乡中情形。

请你替我问候乡里的同志们，希望大家努力和进步。

此复，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八日

（根据手稿影印件刊印）

注 释

〔1〕毛逸民，湖南湘潭人。当时任中共湘潭县第三区委员会宣传委员。

致毛泽连、毛远悌〔1〕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泽连、远悌：

来信收到。

慰生六婶〔2〕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长沙住得太久。

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

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

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祝你们都好！

毛 泽 东

十二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毛泽连，毛泽东的堂弟。

毛远悌，毛泽东的远房侄子。

〔2〕慰生六婶，毛泽连的母亲。

致黄炎培⁽¹⁾

(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

任之先生：

北戴河的信，九月四日的信及讲稿⁽²⁾，均已收到，甚为感谢。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³⁾，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说来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⁴⁾，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

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5〕}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行的。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6〕}，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上海川沙人。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民主建国主任委员。

〔2〕指黄炎培1952年9月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

会上的讲话稿，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

〔3〕毛泽东对黄炎培讲稿的修改，主要有下列几点：（一）毛泽东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二）毛泽东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毛泽东加写了“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四）在讲稿最后一段，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并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4〕“五毒”，指一些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

〔5〕《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帮助干部学习理论的刊物。

〔6〕原信系从右至左竖写，“如右”即“如上”。

致 廖 静 文^{〔1〕}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静文同志，

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2〕}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3〕}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顺致

敬意

毛 泽 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手稿影印件刊印）

注 释

〔1〕廖静文，画家徐悲鸿的夫人。

〔2〕指徐悲鸿。徐悲鸿（1859—1953），江苏宜兴人，画家。建国后，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

〔3〕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致田家英^{〔1〕}

（一九五四年三月二日）

家英同志

（一）杨秀生^{〔2〕}信请抄转长沙杨开智^{〔3〕}先生，询问信内所述情形是否属实，我完全不记得了。

（二）今年寄杨家补助费1,200万元^{〔4〕}，上半年的600万元宜即寄去，请予办理。

（三）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5〕}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6〕}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毛泽东

三月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田家英（1922—1966），四川成都人。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杨秀生，湖南长沙人，杨开慧的族兄。

〔3〕杨开智，杨开慧之兄。

〔4〕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8月1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的旧人民币。按规定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5〕柳直荀(1898—1932)，湖南长沙人。曾任湖南省农民协会秘书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分特委书记。1932年牺牲。

〔6〕杨开慧，毛泽东的夫人。

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石城乡支部
石城乡政府 诸同志：

毛月秋⁽¹⁾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

我的亲戚唐家坨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现有文炳璋⁽²⁾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坨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此致

同志的敬礼

毛 泽 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毛月秋，湖南湘潭人，大革命时期曾在韶山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建国后在韶山毛泽东旧居做过接待工作。

〔2〕文炳璋，毛泽东的表侄。

致李达^{〔1〕}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鹤鸣兄：

十二月二十日的信及两篇文章^{〔2〕}，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李达(1890—1966)，号鹤鸣，湖南零陵人，哲学家。当

时任武汉大学校长。

〔2〕指李达写的《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后来刊载在1954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上）和《胡适思想批判》（后来刊载在《新建设》1955年1月号上）。

致林铁⁽¹⁾

（一九五五年三月五日）

林铁同志：

此事²请你予以处理。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毛泽东

三月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林铁，1904年生，四川万县人。当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河北省省长。

〔2〕指毛泽东的卫士带回的一封信中反映的安平县一个村在实现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简单化地用“是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蒋介石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问题。

致曹云芳^{〔1〕}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一日）

云芳同志：

七月八日的信收到，甚慰。罗哲^{〔2〕}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3〕}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顺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曹云芳，原是罗哲烈士之妻。大革命时期她曾随罗哲一起

在毛泽东领导下做革命工作。

〔2〕罗哲，湖南株洲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时期曾随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牺牲。

〔3〕张维（1898—1975），湖南浏阳人。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1949年9月起，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教授。

致黄炎培^{〔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

你们的会议^{〔2〕}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间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来，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

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3〕}，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

〔2〕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956年10月间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在同年11月间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3〕这里的“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这一年填的一首词是《浪淘沙·北戴河》。“今年”即1956年填的一首词是《卜算子·咏梅》，公开发表时题目改为《卜算子·咏梅》。

致杨开英^{〔1〕}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2〕}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仍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尚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3〕}及杨子珍夫妇^{〔4〕}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根据手稿影印件刊印）

注 释

〔1〕杨开英，湖南长沙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堂妹。当时在大连第三中学任副教导主任。

〔2〕毛世美，现名毛臻，毛泽东的远房侄孙。

〔3〕指杨开慧的母亲。

〔4〕即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字子珍）及其夫人李崇德。

致臧克家^{〔1〕}等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臧克家，1905年生，山东诸城人，诗人。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致孙燕〔1〕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佩君同志：

五月十六日的信收到。已在初中毕业，甚慰。升学的事，我不宜于向学校写信。能否考取，听凭学校。如不能升学，可以在家温课。寄上三百元给你母亲，以后还可寄一些。不要忧虑。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孙燕，学名孙佩君。她的母亲陈玉英曾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家里当保姆。

致张治中^{〔1〕}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二日）

文白先生：

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2〕}，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宽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张治中（1890—1969），字文白，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2〕《六十岁总结》，是张治中于1949年冬60岁时口授的一份自述。

致邓小平〔1〕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五日）

小平同志：

这好象是一个彻底的办法。请你想一下，并和一些同志谈一下，有些党、政、军部委，或者多数部委，都仿农垦做法〔2〕，是否可以呢？三分之二下去，三分之一留家，下去四个月，似乎可以吧？究竟如何，请你酌定。

毛泽东

六月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邓小平，1904年出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2〕指当时农垦部派出三分之二的干部到基层参加劳动、进行整风和帮助工作，留少数干部在机关处理日常工作的部署。

致周世钊⁽¹⁾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惇元兄：

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²⁾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

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3]。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十一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周世钊（1897—1976），字植元，又名敦元、东园，湖南宁乡人。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58年7月起任湖南省副省长。

〔2〕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3〕牛郎星不属大熊星座，它是天鹰星座中的 α 星。大熊星座中的星和牛郎星都属银河系。

致胡乔木、吴冷西^{〔1〕}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日）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2〕}，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爭。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3〕}阅后退回。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上午四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吴冷西，1919年生，广东新会人。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

〔2〕指1959年6月广东东江流域暴雨造成的大水灾。当时东江流域几个县的县城和绝大部分村庄，农田被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

〔3〕指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二八〇一期上刊登的广东东江流域遭受大水灾的消息。

致刘少奇、周恩来等

(一九五九年八月三日)

少奇、恩来、彭真、尚昆^{〔1〕}同志，各组组长^{〔2〕}同志：

简报上对于同志的称呼不妥当，这种旧习惯应当改过来。建议：一律称某某同志。例如：主席，称毛泽东同志；总理，称周恩来同志；林总，彭总、贺总，称林彪同志，彭德怀同志，贺龙同志。其他，以此类推。如同意，请各组长在会上宣布一下。请尚昆告简报编者，一律从四日起照此改正。

毛泽东

八月三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2〕指当时庐山会议所分各组的组长。

致 陈 云^{〔1〕}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陈云同志：

信收到。病有起色，十分高兴。我走时，约你一叙，时间再定。心情要愉快，准备持久战，一定会好的。

毛 泽 东

十二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陈云，1905年出生，上海青浦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致邓小平^{〔1〕}

（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小平同志：

此作^{〔2〕}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如果中央二十四万人中，已减三分之一，即八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四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十二万人，占总数二十四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三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减，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另外工人减二千万，人民公社三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二十二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指习仲勋1961年6月19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

致胡乔木^[1]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乔木同志：

八月十七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²。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3]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 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见曹操《步出夏门行》。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曹操集》中作：“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3〕谷羽，胡乔木的夫人。

致陆定一^{〔1〕}等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定一、康生、恩来、少奇、小平、彭真^{〔2〕}同志：

此事应当改变。画男女老少裸体Model^{〔3〕}是绘画和雕塑必须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坏事出现，也不要紧。为了艺术科学，不惜小有牺牲。请酌定。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

〔2〕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恩来，即周恩来。

少奇，即刘少奇。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3〕Model，英语单词，汉语一译“模特儿”。

致陈毅⁽¹⁾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²⁾善七律，董老⁽³⁾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西 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
风雪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⁴⁾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⁵⁾，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⁶⁾，“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⁷⁾。韩愈⁽⁸⁾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

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9]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10]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1〕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他写了很多诗。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毅诗词选集》。

〔2〕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他写的词诗很多，现在已经出版的有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远望集》和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叶剑英诗词选集》。

〔3〕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写了很多诗。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董必武诗选》。

〔4〕杜甫，唐代诗人。

〔5〕见《诗集传·周南·葛覃》朱熹注。

〔6〕见《诗集传·周南·蟋蟀》朱熹注。

〔7〕见《诗集传·周南·关雎》朱熹注。

〔8〕韩愈，唐代文学家、诗人。

〔9〕李白，唐代诗人。

〔10〕李贺，唐代诗人。

（以上书信分别引自《毛泽东书信选集》一书。）